

闽越冶城地望的新证据

吴春明

本文从文献资料中发现了秦汉闽越、东瓯史地变迁的最新线索,认为“章安故冶,闽越地”是闽越国与初置于闽越故地的冶县曾一度控有东瓯故地的历史实录,而不是闽越故地及冶城在浙江的根据。西汉后期起,析冶县东瓯故地置回浦县,才形成“闽越为冶”在福建、“东瓯为回浦”在浙南的局面。通过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分析,确定闽越遗迹集中分布的今福州一带正是文献描述的海滨冶城,而闽北汉代城址只是余善的割据地。

吴春明,1966年生,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职博士研究生。地址:厦门市,邮编361005。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秦汉初闽越国都(东)冶,西汉中期闽越国除置冶县。闽越冶都及冶县县城的地望是东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课题。

解放前的冶城研究主要依据汉唐以来的文献资料,叶国庆先生首先提出冶都、冶县县治在浙南章安;劳干先生认为冶城在今福州。^①解放后,随着闽越考古,特别是闽北地区秦汉城址的连续发现,^②许多人又先后提出冶城在闽北,蒋炳钊说冶都在闽北浦城,汉冶县在浙南章安;张其海、林忠干、林蔚文、杨琮等都认为闽北崇安汉城就是闽越冶都旧址。^③

本文通过对汉唐史籍的重新发掘、整理,结合闽越考古遗迹的分析,为闽越冶城福州说提供新的证据。

一、释“章安故冶,闽越地”与 “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

闽越故治地望在浙江或福建之争论的主要原因是汉唐史籍记载秦汉东南历史的片断章节存有含糊和“矛盾”之处。浙江说的主要根据是《后汉书·郡国四》说:“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

① 叶国庆:《古闽地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劳干:《汉晋闽中建置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册,1935年。

② 林忠干等:《福建浦城三处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3年第2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福建崇安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③ 蒋炳钊:《对闽中郡治及冶都治县地望的一些看法》,《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林忠干:《崇安汉城遗址年代与性质初探》,《考古》1990年第12期;林蔚文:《西汉闽越冶都考证》,载陈存洗主编《闽越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80页;杨琮:《论崇安汉城的年代与性质》,《考古》1990年第10期。

更名”，并考西汉闽越、冶县地先后沿革为东汉章安和永宁两县，都是唐宋浙南各郡、州、县。^①福建说的主要根据是《嘉泰会稽志·历代属州》所说的“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考前者沿革为汉唐福建各郡、州、县，后者为浙南各郡、州，并认为《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章安故冶，闽越地”有误。^②重新发掘汉唐史籍的各种线索，梳理秦汉闽中地理变迁的复杂过程，可知上述两说都有失之偏颇的地方。

实际上，“章安故冶，闽越地”是西汉前期东南政治地理格局中闽越国、冶县曾经控有东瓯故地的历史实录，而“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是西汉后期行政区划中形成的“新局面”。

闽越、东瓯是东南方两个关系密切但有区别的人群。《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驹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东瓯王。”“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汉朝“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从闽越与东瓯、汉朝的战争形势与东瓯的迁移路线看，汉朝的江淮、东瓯地、闽越故地在空间上是自北往南顺序排列的，闽越在东瓯南面，两族原住地的分界是清楚的。《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说明闽越紧靠于南越即岭南之东，暗示它就在今福建一带。

但是，两族又是地域相连与种族相近的。秦时合为闽中郡，汉初虽分别复国，但仍合称“东越”。有趣的是，建元三年汉朝将东瓯人内迁江淮后，没有一条文献记载曾在东瓯故地设置郡县。不难推测，是闽越国乘势占据了东瓯故地，《史记·东越列传》有重要的线索，文中将此后的闽越国直接称为“东越”，如“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天子曰东越地多狭，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直到闽越（东越）国除后，闽越、东瓯故地设县初期只有一个冶县，两地仍维持“统一”的局面。《晋书·地理志下》载：“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冶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又《宋书·州郡志》载：“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出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从这些文献可知，闽越（东越）故地上初置郡县时只有“冶”县，而没有说东瓯地同时另设什么县，无疑“冶”县初设时也延续了闽越国后期控有东瓯地这一既成事实，统有闽越、东瓯两故地。郡国志所说“章安故冶，闽越地”应就是对东越地设县初期行政格局的含糊描述。《通典·州郡十一》载：“永嘉，汉冶县地，后改为章安，后又以章安东瓯乡为永宁县，初汉惠帝立越东海王摇，于东瓯即此。”比郡国志说得要明确些。

冶与回浦并列是西汉后期新出现的局面。《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县二十六：吴、曲阿、乌伤、毗陵、余暨、阳羨、诸暨、无锡、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剡、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钱唐、鄮、富春、冶、回浦。”谈到了“冶”与“回浦”两县并列，但并没有交代这两县分别设置于何时。《嘉泰会稽志·历代属州》载：“大抵南至晋安东至章安皆冶县地，详而言之则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这似乎是一句前后“矛盾”的话，但不难从中获得启示，晋安、章安“皆冶县

① 叶国庆：《古闽地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

② 劳干：《汉晋闽中建置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册，1935年。

地”在先，“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在后。就是说，汉志中“冶”与“回浦”的并列只是二地分设县以后的“新局面”，而不是冶县初设时的形势。二县分设不可能早至冶县初置时，但汉志罗列的都应是西汉郡县，所以析冶县东瓯地置回浦县应是西汉后期。因后代史家都将冶与回浦二县的设置误为同时，引《嘉泰会稽志》时又只注意“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的局面，忽视了“皆冶县地”的这一初期局面。

汉朝在东越地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配置了驻军都尉。东越地都尉的变迁，与冶县分立为冶与回浦两县的情形正相吻合。前引《会稽典录》，东越地初置冶县的同时，设立了“东部都尉”，后来都尉治所由冶相继迁到章安、鄞、句章。东越地初设都尉时也只有“东部都尉”，统闽越、东瓯两故地，又称“东南都尉”，即《汉书·杨雄传》所说“东南一尉”，颜师古注引孟康语“会稽东部都尉也”；又《太平御览·职官部三十九》载：“临海记曰，汉元鼎五年，立都尉于侯官，以镇两越，所谓东南一尉也。”王国维考都尉初设时治于冶城，西汉后期迁于章安，东汉再迁于鄞、句章，治所迁离冶城后还留一侯官于冶城。^①

东汉末，东部（东南）都尉一分为二。《三国志·贺齐传》载：建安八年“侯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齐进兵建安立为都尉。”《宋书·州郡志》更明确讲：“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通典·州郡十一》也说：“其地属会稽东部都尉”，“后汉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此（闽越地）为南部都尉，东部今临海县地。”

由东部都尉一个统领，发展到“东部都尉”、“南部都尉”二个分治，这与该地初由冶县统领、后发展为冶与回浦二县分治的过程吻合。只不过分都尉较晚，但性质是一样的，说明汉朝在闽越、东瓯故地设置的行政机构都是从一个统管发展到两个分治，都是建立在东越故地社会经济与人口逐步增长的基础上的。

总之，史籍中有充分的线索表明，在两汉东南政治地理沿革中，“章安故冶，闽越地”为先，“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在后。东越地处东南一隅，远离中原文化中心，汉唐史家对发生在东南的事情难有完全清晰可靠的记录，后代人没能分清前后发生的两个历史事件，难于理解个中的“矛盾”。胡三省、钱大昕及劳干等相信“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是真，无奈地称“章安故冶，闽越地”有误，^②终究未能彻底拨开历史的迷雾。叶国庆等又误解了“章安故冶，闽越地”的本意，错将章安作为故冶与闽越地的全部，而考闽越及汉冶县在浙江，^③恰好把闽越、东瓯的地理格局颠倒了。

二、说“闽越为冶”在福建与 “东瓯为回浦”在浙南

西汉冶县初设时领有闽越、东瓯两故地，西汉冶县与闽越冶都同名，而东南地理中再没有第二个冶地了，这说明冶县县治就设在闽越国的旧都冶城。换句话说，冶县初置时虽地跨闽

① 王国维：《后汉会稽郡东部侯官考》，《王国维遗书》第2册，《观堂集林》卷第12，第24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② 《后汉书》志第22《郡国四》语“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勘校记按语：“《通鉴》胡（三省）注引洪氏《隶释》，谓中有脱文，当作‘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侯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500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4《东部侯国》按语：“志以章安为故冶，疑未可信。”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版，第305页；并前引劳干文。

③ 叶国庆：《古闽地考》，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

越、东瓯两地,但冶县的中心、本土在闽越故地,东瓯地只是冶县的领地。正因此,西汉后期析东瓯地置回浦县时,才顺势形成“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的局面,而不是“东瓯为冶”。所以,颜师古注汉志“冶”为“本闽越地”。可见,西汉后期形成的“闽越为冶,而东瓯为回浦”格局,正是建立在闽越、东瓯故有地域基础上的。东汉至隋唐,冶与回浦两县分解出诸郡、州、县,从中可推知“闽越为冶”在福建,而“东瓯为回浦”在浙南。

首先,“闽越为冶”在福建。前引王国维考,东部都尉于迁到章安后,改设东部都尉下一侯官于冶县,又前引晋志语东冶“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因东汉以后冶城改称为“侯官”,冶县也称为“侯官”县。《后汉书·郑弘传》注引《太康地理志》说:“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侯官,今泉州闽县是。”《元和郡县志·江南道五》也说:“汉于其地立冶县属会稽郡,后汉改冶为东侯官”。三国时扩侯官县为建安郡,西晋时分为建安、晋安两郡。晋志载:“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建安、吴兴、东平、建阳、将乐、邵武、延平。”“晋安郡,太康三年置。统县八,户四千三百。原丰、新罗、宛平、同安、侯官、罗江、晋安、温麻。”据《元和郡县志·江南道五》、《通典·州郡十一》等,唐代改建安郡为建州,仍统闽北各县地;析晋安郡为福、泉、漳三州,分别统闽东、闽中、闽西南各县地。

其次,“东瓯为回浦”在浙南。《后汉书·郡国四》载:会稽郡十四城有“浙江、鄞、乌伤、诸暨、余暨、太末、上虞、剡、余姚、句章、鄞、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东部侯国。”刘昭注“章安”引《太康记》曰:“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立。”就是说,西汉后期增设于东瓯故地的回浦县,曾一度并入鄞县为回浦乡,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复县更名章安,永和三年又析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三国时,这一带扩为临海郡,《三国志·(吴)三嗣主传》载: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晋书·地理志》载:“临海郡,吴置。统县八,户一万八千。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东晋时,临海郡分为临海、永嘉二郡,《宋书·州郡一》载:“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永嘉太守,晋明帝太宁元年,分临海立。”据《元和郡县志·江南道一》、《通典·州郡十一》等,隋改永嘉郡为处州,唐高宗时析处州为处州、温州,唐武德间相继改临海郡为海州、台州,都是今浙南地。

就是说,虽闽越国和冶县初设时都曾先后统领东瓯故地,但闽越国的中心、冶县本土仍然在闽越国故地。而冶与回浦分开后,冶县治于闽越故地,沿革为汉唐福建各郡、州、县;回浦治于东瓯故地,发展为浙江南部的诸郡、州、县。冶县管辖的空间虽有变化,但都应是延续了闽越国的故都冶城而治,也才会始终沿用“冶”县名。只是东汉以后因设东部都尉下一侯官于冶县,冶县才更名为“侯官”县。所以,闽越冶都、汉冶县(侯官县)县治是一个地方,冶城是福建秦汉时期延续发展的一个中心城市。

三、福州冶城遗迹的新探索

《通典·州郡十一》载:唐代福州八县有“闽”和“侯官”两县,“闽越王无诸都东冶即此,汉东冶县,后汉改为侯官。”即今闽江下游的福州至闽侯间,冶城应就在这一带。

在东南百越地带,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心一般都处于大江大河入海口一带,且郡县时代的治所一般都延续使用王国时代的都城。如于越国都会稽城就位于长江下游古文化中心地的太湖流域,发展为汉会稽郡治;南越国都番禺也发育于岭南早期古文化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后为南海郡治。闽越冶城应不例外,在福建沿海诸河中,闽江为大,地处闽江下游的福州一带发展为

闽越冶都、闽中郡治和冶县治所,也应是顺理成章的。

在福建先秦文化谱系中,闽江下游的考古文化源流最长远、序列最完整、土著文化特征最浓厚、发展水平最高,这一带无疑是闽越先秦文化的核心地带。闽江下游的先秦遗址成群分布,许多“大遗址”堆积深厚且内涵跨越的时间长,从宏观聚落形态的角度看,已经形成闽越早期文化“中心地带”的雏形。重要聚落址基本上都密集分布于福州与闽侯间的闽江沿岸,昙石山、庄边山、溪头等遗址的规模都已达10000平方米以上,昙石山下、中、上、表层和溪头下、上层堆积均是从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前期一直延续至两周时代;庄边山、黄土仑、古洋、浮村、冶山、盘石山等也含有新石器或青铜文化遗存,而浮村、冶山、盘石山、庄边山等的上层更直接叠压着秦汉前后的闽越文化地层。群址密集分布程度、聚落规模及延续发展的完整序列,在闽越地区的考古资料中是唯一的。^①因此,早在先秦时期,闽江下游已经成为闽越文化繁荣发展的中心地带,闽越国政治中心冶城的形成不会是秦汉时期短暂的历史事件,这一先秦闽越文化中心地带应就是闽越国时期政治中心形成的直接基础。

闽江下游还是秦汉闽越国遗迹最为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这里先后发现了闽侯庄边山、杜坞、福州金鸡山、庙后山等墓地,福州浮村、冶山、盘石山、新店古城等建筑遗址。^②在地层上,浮村、冶山、盘石山、庄边山等闽越国遗存都有直接叠压在先秦土著文化层上的迹象。从内涵的发展看,金鸡山、庙后山、杜坞等闽越国墓葬中,随葬的几何印纹陶器也与先秦文化具有明确的延续关系。在聚落的宏观分布上,闽江下游的这个闽越国遗迹密集分布区与先秦闽越土著文化遗址分布的中心地带基本重叠,但略向东移,除庄边山外,均位于今福州城北及北郊一带。城址、居址和墓地密集分布,这在闽越考古中是唯一的。这些遗迹间还表现出一定的布局规律,诸墓地集中于西部,建筑遗迹见于东部。

在这些闽越国遗迹中,福州北郊的新店古城最引人注目,这是一座大致呈长方形的夯土城址,北倚高耸的古城山、莲花峰、飞来峰。经勘察,北墙长约310米,西墙残长478米,东墙残长287米,城址的南至和南墙情况不明。经初步发掘,从地层关系确定了该城始筑于战国晚期、先后补筑于汉代和唐宋时期,文化层中还找到了秦汉前后典型的闽越族陶器等物质文化。城内西部的小规模试掘发现了一处汉初建筑,夯土基址和回廊已经局部出露,目前还在进一步工作中。浮村、盘石山等建筑遗址正紧邻古城的南部和东南部,很可能是古城建筑体系的一部分。浮村、冶山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绳纹板瓦、筒瓦、卷云纹瓦当和几何纹铺地砖等遗存,显然不是一般的闽越平民居址,而应是闽越上层贵族的人间天堂。宋梁克家《三山志·地理类》载:欧冶池在“今将军山之北,昔冶山之麓也,亦名东冶。及俗呼欧冶,皆以东越故耳,……谓欧冶子善为铸剑者,事载越绝书颇详,此池乃欧冶子铸剑之地。”“闽越故城在今府城冶北二百五步。”清林枫《榕城考古略·城榷第一》也说:冶城“当在今城隍庙北至诸古岭等地也。今北门华林坊半有桥,委平陆中,故老有指为古冶城西外之桥者。”晋武帝太康三年“太守严高狭视冶城规划,将移白田渡,嫌为南向。”所指冶城位置正是福州北郊的这一闽越建筑遗迹分布区。

① 林公务:《福建史前文化遗存概论》,《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拙作:《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史前文化聚落形态研究的几点思考》,《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3期。

② 林公务:《闽侯庄边山的古墓群》,《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曾凡:《南福铁路过程中福州附近的考古发现》,《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福州洪塘金鸡山古墓葬》,《考古》1992年第10期;黄汉杰:《福建荆溪庙后山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第6期;曾凡:《福州浮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欧潭生:《南方古城考古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15日。

从福州城区水陆变迁过程看,今福州市南部与南郊至少在秦汉时期仍是尚未成陆的闽江口海域。^①《三山志·地理类》谈到宋代福州罗城大壕(今城内澳桥)时说:“相传无诸时四面皆江水,此如屋澳,舟楫所赴,北会山原,东达行路。”就是说,上述闽越国建筑遗迹密集的福州北郊至城北一带在秦汉时正处于闽江口北岸的半岛形台地上,构成一座背山面水、临古闽江口宽阔海域的闽越沿海港口城市。《山海经·海内南经》称:“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后汉书·郑弘传》说:“旧九趾七郡献贡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三国志·王朗传》说:“王朗为孙策所败,从会稽浮海至东冶。”福州北郊的闽越国城址正与这一海滨冶城形势相吻合。

上述闽越国时期的建筑和墓葬遗迹还有延续至东汉以后的线索。冶山建筑、新店古城的闽越遗迹之上都发现了东汉、六朝甚至更晚的遗存;庙后山墓地1号墓和金鸡山墓地19号墓均属于东汉前后,两墓地还有不少两晋南朝墓葬,附近的白沙、屏山、荆溪、仓山、茶园山、老鼠山、乌山等地点更发现了近30座两晋南朝时期的墓葬,是福建同期墓葬最集中的发现。^②这些迹象又与闽越冶都延续作为汉冶县、侯官县治所及六朝郡治的历史相符。

因此,福州就是作为闽越国都和两汉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冶城的所在地,福州地处闽越及我国东部沿海,所以“冶”又常称“东冶”,是一个地方。

四、闽北秦汉城址为余善割据遗迹

《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十二》说闽北的邵武、浦城等“本后汉东侯官县之北乡”;又《读史方舆纪要·福建三》载:“志云建安初分侯官之北乡置建安县。”由此可见,闽北不是汉代冶县、侯官县的中心,而是它的“北乡”。但是,解放后在闽北地区发现了一系列的闽越国城址,如浦城汉阳城、临江城、临浦城、崇安城村汉城,及越王山、金鸡山、平山等遗址。^③从表面现象看,闽北的闽越国遗迹并不少,其中崇安汉城还发现了完整的城市布局、类似宫殿的建筑遗迹等文化内涵,堪称闽越国内的又一政治、经济中心。^④所以许多学者据此立论闽越冶都在闽北,甚至直接指定崇安汉城。^⑤

但是,从这些遗迹的内涵特点及文献中有关闽越国史的一些细节分析,闽北不可能是冶城所在地。

闽越国后期因余善的分裂,已形成二王并处的局面。《史记·东越列传》载:“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拒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

① 林汀水:《福州地区水陆变迁初探》,《福建文博》1986年第1期。

② 林忠干等:《福建六朝墓初论》,《福建文博》1987年第2期。

③ 林忠干等:《福建浦城三处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3年第2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福建崇安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谢道华等:《福建建阳县邵口柘汉代遗址》,《考古》1988年第7期;《福建平山汉代遗址》,《考古》1990年第2期。

④ 拙作:《崇安汉城的年代与族属》,《考古》1988年第12期;《再论福建崇安汉城遗址的年代等问题》,《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2期。

⑤ 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林忠干:《崇安汉城遗址年代与性质初探》,《考古》1990年第12期;林蔚文:《西汉闽越冶都考证》,载陈存洗主编《闽越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80页;杨琮:《论崇安汉城的年代与性质》,《考古》1990年第10期。

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附，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因立余善为东瓯王，与繇王并处。”“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咸入东越。”“从繇王居股谋……杀余善”。可见，繇王丑、从繇王居股继承了郢的正统王位，所谓“奉闽越先祭祀”，当然也是留守故都冶城的嫡系。余善杀兄、刻“武帝”玺另立山头，是不可能在冶城与繇王并处的。《史记·东越列传》虽没有指明余善的据点，但却提供了有关余善老窝在闽北的线索。闽北是入闽中的主要通道，建元六年汉朝攻闽越的两路兵马就是出豫章、会稽指向赣浙闽山区，郢也曾“发兵拒险”于此；元封元年攻闽越时，四路兵马中除韩说“浮海”外，其余三路也从赣浙山地向东南直指闽北。^①在这次汉越大战中，居股并没有到闽北御汉，盘踞闽北阻击汉军的是余善。

史籍中有大量关于余善盘踞闽北且筑城拒汉的记载。《史记·东越列传》载：“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读史方輿纪要·福建三》载：“汉阳城在县北”，“志云今县城亦汉东越王余善创筑，后废，唐为浦城县。”光绪《浦城县志·城池》载：“余善发兵守险拒汉道，处处筑城以自固，殆非今县城，或曰即今仙阳也。唐时为仙阳镇，今县志据旧志云亦筑自余善。”《浦城县志·坛庙祠祀》载：“东越王庙在南乡清湖里，即东越王余善也。尝即拓溪之滨筑城以居，后见杀于繇王居股，浦民立庙祀之。”康熙《建宁府志·山川》载：“汉东越王余善筑城临浦，号浦城，后废。”《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十二》载：“废乌板城，在（邵武）县东南三里，建安记云：昔越王拒汉，其城六，此城一也。”《读史方輿纪要·福建三》载：“大潭城在县治西，志云昔闽越王筑城于此以拒汉，下瞰溪潭因名。今有大潭山，山势蟠屈。”又康熙《建宁府志·杂志》载：建阳“大潭城，在县治西隅，其地四面环绕，闽越王因山势筑城以拒汉，下瞰溪潭故名。”《读史方輿纪要·福建三》载：“闽王城，（建阳）县北三十里，相传王审知所筑，其中殿基犹存，今土埠周回，隐隐如城，外有水田环绕，盖城壕云。今土人呼其地为王殿村，亦名城村。”崇安古属建阳，兴田乡城村旧称“古粤”，民国《建阳县志·城市志》载：“上里城村，古名粤城。”今城村村口门楼上仍遗存古时镌刻的“古粤”两字，所以“闽王城”应也是闽粤王城，“王审知所筑”系讹传。除了这些城址外，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余善史迹。乾隆《福建通志·古迹》载：浦城越王行宫“在县东隅，汉越王余善建，今在胜果寺。”浦城越王台“在越王山巅，越王筑台置烽墩于此。”邵武越王台“在郡治东北，世传越王驻猎之所，樵牧者时得古瓦，皆罗纹燕翅，扣之坚如金石。”

经调查，浦城仙阳乡的汉阳城址，筑于大王滂山的二个山岗上，依山建成不规则形的二个土城圈犹存，残长 300 余米，东南向临溪流的一段立于陡峭的岩壁，地势极为险要，全城最高的南墙所在山脊上建有墩子形的烽火台。浦城临江乡锦城村的临江溪边的临江城，残存夯土城墙约 30 米，地表散布许多绳纹筒瓦、板瓦和印纹陶器等物，均为典型的闽越文化。浦城石排下村山顶上的临浦城，残存一段 500 米长的土垣，地表仍散布有闽越时期的印纹陶片。而在城村西南的崇溪河畔发现的汉城遗址是闽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闽越遗迹，夯土城圈周长达 2896 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筑于起伏险要的山峦之中，在全城最高的西南角乌龟山建有烽火台。这些城址均位于崇山峻岭地带、溪流峡谷之中的兵家必争之地，且除崇安城村的闽王城外，其他诸

^① 汉句章属会稽，武林在江西余干县东北，梅岭在江西豫章东北，若邪在绍兴，白沙约江西鄱阳县界。参见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91 页。

城规模都很小,具有鲜明的军事堡垒特征。城村闽王城不但规模最大,还有诸多为其他各城所不及的复杂内涵,在具备军事防御功能的同时,该城还形成了一个完备的“都城”格局。如以城中央地带的高胡坪甲组建筑基址,平面中心为面阔七间(37.4米)、进深六间(24.7米)的殿堂,且前朝后寝,绕以厢房,墙面绘富丽的彩色壁画;使用“常乐未央”、“常乐万岁”、“万岁”、“乐未央”文字瓦当,日用印纹陶器上常见有“官”、“官黄”、“官径”、“乾官”等戳印文字,不是一般性的城堡和居址,确实具有“王宫”的特点。同时,城圈上东西两侧有对称的城门,探明连接城门及宫殿建筑的卵石结构道路五条,城内外还发现了至少六处居住遗迹、四处冶铁作坊和一处制陶作坊,具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特点。在上述六个城址中,乌板、汉阳、临江、临浦、大潭五城处于偏北、西北方向,靠近闽越御汉的前线,而崇安汉城位置偏东南腹地,是六城堡的中心。因此,崇安汉城应就是闽越国后期余善割据为王的据点,又是他率领闽越军御汉的军事指挥中心,但不是繇、居股“奉闽越先祭祀”的冶都。

《汉书·朱买臣传》载:“是时,东越数反复,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去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东南地理中的泉山有福建福州、泉州、浦城和浙江江山、永嘉等多处,但只有浦城泉山才是余善居保地。^①《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十二》载:浦城“泉山在县东北六十里云山顶,有泉为两脉,一入处州,一入建溪,即汉书朱买臣言东越王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即此山。”这里正处闽浙赣交界处的武夷、仙霞两大山脉之间,扼闽越通外界之孔道。光绪《浦城县志·疆域》载:“无事则四达必由之路,有事则百战必争之地。”余善只有在这里守险,才与汉朝三路兵马集结闽浙赣边界的形势吻合。根据《朱买臣传》,汉兵直指泉山时,余善“徙处南行”跑了五百里,汉兵乘势“席卷南行”追穷寇,余善跑到哪里去了?依《史记·东越列传》,他最后被从繇王居股所杀,可见到了冶都,又他所逃往之处“居大泽中”,正与冶城福州毗临江海的地理环境特点相吻合,而福州也恰在闽北东南方五百里左右。所以,冶城不可能在闽北,而就在福州。

[责任编辑 郭爱民]

^① 林蔚文:《汉代东越泉山考》,《地名知识》1984年第2期。